



欧洲观察

European Survey

2020年第6期·总第179期

- ◎ “转型中的欧盟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研讨会综述
- ◎ 智库报告编译：在中美竞争中定位欧盟
- ◎ 学会合作举办“后疫情时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与中欧关系前景研讨会
- ◎ 学会举办英国对华政策座谈会
- ◎ 学会合作举办“转型中的欧盟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研讨会
- ◎ 学会举办中美欧关系座谈会
- ◎ 学会举办巴尔干地区形势座谈会

Feature Topics

☞ **A Review of the Seminar on the Transformational EU and its Impact on China-EU Relations**

☞ **Thinktank Report Digest: Positioning the European Union within the Sino-American Rivalry**

☞ **SIES Co-holds a Seminar on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Prospect of China-EU Relation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 **SIES Holds a Discussion Meeting on UK' s Policy towards China**

☞ **SIES Co-holds a Seminar on the Transformational EU and its Impact on China-EU Relations**

☞ **SIES Holds a Discussion Meeting on China-EU-US Triangular Relations**

☞ **SIES Holds a Discussion Meeting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Balkans**

学术交流

“转型中的欧盟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研讨会综述

当前，国际格局处于深刻变革之中。本月1日，德国接替克罗地亚成为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接棒后的欧盟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德国将如何引领中德、中欧关系向前发展？这是学界亟需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此背景下，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联合上海欧洲学会，于2020年7月22日举办“转型中的欧盟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研讨会。会议围绕以下两个主要议题展开学术研讨：一、欧盟结构转型的特征及挑战；二、中欧关系动态及推动中欧合作发展的路径。来自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莅临参会。会议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主持。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明棋致欢迎辞。他代表活动主办方向莅临本次会议的学界同仁表示热烈欢迎，对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对此次活动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疫情冲击之下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在经历关键的变动，欧洲的转型及其未来发展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对传统认知和判断带来挑战。在全球化低潮、逆全球化抬头的背景之下，中欧关系正变得愈加重要。欧洲内外部的冲突、矛盾及其应对也为欧洲研究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期待本次活动能够促成研究成果，为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发出上海学界的聲音。

会议研讨分为上、下半场进行，分别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副教授和上海欧洲学会监事曹子衡主持。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明棋做“欧盟对华政策的变化与内在矛盾”主题报告。徐明棋指出，当前欧盟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强化凝聚力，遏制民粹主义势头；二、针对欧洲一体化凝聚共识，重塑跨大西洋关系以及应对新兴国家的崛起。他强调，欧盟对华政策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体现出摇摆性与矛盾性，具体表现为：一、认知层面对中国增加负面评价、强化否定姿态，呈现出原有的积极性评价和日益增长的负面评价共存的矛盾局面；二、各国利益诉求的差异导致欧盟内部对华政策的分歧日益扩大；三、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对华政策方面存在代际差异；四、欧盟内部机构对华政策存在矛盾；五、在宏观表态和具体实践层面表现出的合作-对抗态度差异。他表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长远健康发展需要积极的战略引导。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做“关于新时期欧洲一体化与中欧关系的一些思考”主题报告。丁纯指出，疫情对欧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冲击的规模空前；二、内外矛盾凸显；三、危机与机遇并存；四、逐渐形成共识。他认为，总体而言，疫情的冲击在客观上将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发挥积极推动作用。中欧关系方面，丁纯强调，我们对欧方的经贸诉求，以约翰逊、马克龙为代表的欧洲新生代领导人带来的新思维、理念的差异、中国对于次区域关系的处理以及中欧相互认同的下降需要认真观察，高度重视，谨慎处理当前中欧关系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叶江研究员做“中欧对‘伙伴’定义的异同与中欧关系未来前景”主题报告。他认为，中欧双方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认知存在明显差异，产生这一差异的外部环境是当今世界正在进入政治决定经济的时期，同时，现实主义的理念在欧盟的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中占主导。叶江指出，观念建构的差异将会对中欧关系的后续发展产生关键影响。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做“欧洲绿色新政的内涵、挑战与前景”主题报告。他指出，欧洲绿色新政是综合性极强的一揽子举措，经济增长是核心目标，同时涉及了诸多社会属性，兼备欧洲和全球的视角，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和影响。具体措施方面，包括制订气候法、推动经济各部门脱碳转型、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可持续的食品及农业政策、引入公正过渡机制、动员公众广泛参与、积极开展绿色外交等。但绿色新政的实际效果取决于其能否获得政策优先地位和资金支持，以及欧盟机构在协调、执行过程中的权能。他认为，中欧关系将经历“绿色化”——双方在绿色领域有诸多潜在的合作议题。但同时，双方在环境、气候、运输等领域的标准差异将成为双边关系的一大挑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研究员做“欧盟构建欧亚互联互通的政策走向”主题报告，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在发展亚洲运输走廊方面的一系列项目背景、内容做了介绍。她认为，走廊地区交通运输主要存在跨境衔接、自由化程度低以及黑海和里海的连接等难题。张迎红表示，走廊项目的部分措施对于中欧班列和新亚欧大陆桥的建设有着诸多借鉴意义。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忻华副教授做“当前欧盟新领导层的对外经济竞争战略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主题报告。他表示，新上台的欧盟新领导层针对经济层面表现出了强烈的焦虑，竞争成为了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关注焦点。具体来说，以冯德莱恩为首的欧盟领导层有以下三个推动欧盟决策变化的主要关注点：一、对外经济竞争力；二、经济转型中的标准、规则和政策制订的话语权；三、经济对外依存当中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忻华认为，总体来看，欧盟更多地将其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视为竞争关系。政策目标可以概括为对标中美、赶超美国，具体的政策架构可分为进取性和防御性政策体系。中欧关系方面，他强调，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对于欧盟经济主权和技术主权的强化，后续可能对中国与“17+1”国家的交往造成负面影响，中欧关系中的对抗性和竞争性将日益突显。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宋黎磊教授做“欧洲政治碎片化视角下的中东欧政治版图与‘17+1合作’”主题报告。她指出，中东欧地区的政治碎片化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更多的小党和“政治素人”进入议会并获得话语权；二、左翼政党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三、民粹主义政党势力扩大。她建议，中方应当在以下方面做好应对，一、对其政党格局及对华态度进行细分、加强研判，区分民粹主义政党和极右翼政党；二、密切关注中东欧内部政党政治斗争对中国-中东欧关系的潜在冲击；三、密切关注中东欧政党和政治领导人的快速更迭及其影响；四、增强对中东欧“政治素人”和青年政治家的沟通、了解。

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做“欧盟危机管理体系与能力的发展变化”主题报告。他指出，欧盟在安全防务领域的危机管理体系由上世纪末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功能来看，力求体现灵敏性、周期性和全面性三个特点。由于受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等影响，欧盟危机管理能力的发展受到一定阻碍。杨海峰认为，中欧可以在经济领域之外开展第三方合作，如在危机管理和维和等方面的对非合作。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外交学系系主任张骥副教授做“中欧在变

局中的战略定位”主题报告。他强调，中欧双方对于“战略伙伴关系”的认知和定位存在明显差异。在百年大变局下，中美战略竞争强化，美欧联盟体系的基础仍在但裂痕也在深化，美国对欧采取现实主义和自利的外交政策，并强化对盟国的外交控制，欧洲领导人开始强调“战略自主”的问题。在此局面之下，张骥认为，中欧在中美欧三角关系中找到自身的定位，对双方来说均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对中欧关系的定位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具有全球战略意义。总体来看，中欧关系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双方要有创新思维，要抓住机会。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副系主任吕蕊副教授做“新冠疫情影响下的欧盟与世界格局走向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主题报告。她表示，欧盟委员会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方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举措：一、支持新冠疫苗的医学研发；二、向成员国提供医疗指导，成立专家组向成员国提供一些管理措施和建议；三、协调跨境医疗援助；四、确保医疗设备和物资的供应；五、展开一些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国际合作。吕蕊强调，从整体上看，由于公共卫生是由各成员国负责，欧盟只起到补充、辅助作用，因此导致欧盟层面的统一应对较为迟滞。另一方面，欧盟对成员国的医疗物资储备状况不了解；同时，各成员国违背欧盟的原则，在疫情爆发之初“各扫门前雪”，缺乏统一调度与协调，客观上制约了欧盟在疫情应对方面的行动力，导致疫情在爆发初期未能得到有效遏制。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云珍副教授做“英国脱欧之后的中英、中欧关系分析与展望”主题报告。她认为，中英双方在气候、经贸方面仍有诸多潜在合作的可能性，不会任由双边关系恶化，而人文交流有望在中英关系的后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杨云珍指出，中英、中欧关系都是更广泛国际环境的一部分，随着中美冲突的加剧，未来中欧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会逐渐凸显。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助理研究员做“欧盟外交政策新动向”主题报告。她指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欧盟对外战略已经处于转型过程当中，而疫情则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龙静认为，当前这一转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思想理念和舆论上的充分准备；二、在财政、防务、经济等多领域的政策具化。本次疫情对欧盟对外政策的冲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既定议题搁置或延迟；二、周边地区传统与非传统风险与压力上升；三、大国关系的竞争性与对抗性凸显。从新近政策来看，欧盟将“抗疫援助”结合到其对非、对西巴尔干等地区的新战略中，更是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引领者”地位。同时，欧盟对于价值观、法治原则和意识形态的强调也更加明显。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讲师朱宇方做“新冠疫情背景下欧盟经济复苏政策及德国角色”主题报告。她介绍，不久前进行的欧盟峰会持续了四天之久，焦点内容主要包括对于7500亿欧元资助计划的拨款比例以及欧盟多年度财政框架。同时，朱宇方认为，欧盟之所以走出共同负债的重要一步，是欧盟现实困境、德国国内执政联盟态度以及默克尔个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德国从拒绝到主动倡议，直至最终在欧盟层面推动协议达成，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角色转变。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陈弢副研究员做“从德国视角看欧盟在亚洲自贸协定布局”主题报告。他表示，世贸组织多边谈判陷入停滞、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美国对全球贸易的承诺减弱、区域性和双边性的贸易协定发展起来，这是欧盟和亚洲地区的自贸协定的大背景。陈弢指出，对于贸易协定，德国政治、经济、学术界三方主要有如下判断：一、以中国为中心，到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平衡；二、从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到追寻价值观盟友和经济伙伴之间的平衡；三、跟随美国到追寻亚洲的独立政策。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讲师俞宙明做“新冠疫情背景下的欧盟数据战略及中欧合作”主题报告。她表示，通过对《欧洲的数字未来》、《欧洲数据战略》和《人工智能白皮书》三份官方战略文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欧盟数字战略主要包含以下三大目标：一、技术为人服务是以尊重欧洲价值观的方式掌握数字技术；二、建设数字经济，确保公平、确保其有竞争力；三、建设一个开放民主、可持续的社会，为数据发展提供一个可信赖的环境。其中的关键词是安全和隐私、共享和流通以及数据主权。俞宙明强调，三份文件的出台可以被视为欧洲面临来自内、外部挑战而做出的一个理性选择，尤其是其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方面与中美两国的巨大差距、美欧分歧以及“美国优先”背后的地缘政治风险，是这一系列文件出台的重要背景因素。此外，欧洲数字经济在疫情应对方面也暴露出基础设施薄弱、监管过严、缺乏协调、对外国服务的依赖性问题。俞宙明认为，虽然竞争和摩擦不可避免，但合作依然是中欧在数据领域的基调。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戴轶尘助理研究员做“中欧关系与上海城市外交”主题报告。她指出，城市中对外关系主体呈现多元性，对外交往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戴轶尘表示，从中欧关系来看，城镇化进程为中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这一趋势预计仍将维持；从领域来看，城市发展和治理需求的拓展也为中欧双方开辟出数字化、文化产业、创新政策以及绿色经济等新的合作领域和空间；从合作层面来看，城市和地方合作为中欧间的实质性合作提供了抓手，已成为中欧关系中的重要议题。聚焦上海在中欧关系中的定位，她表示，上海的对欧合作空间主要集中在市场和能力方面，制度、科技创新和文化融合将是推动双方友好合作与往来的有力抓手。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还就欧盟对华政策、美欧竞争、中英关系、欧盟复兴基金、数字经济等话题进行了自由探讨。

活动尾声，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致闭幕辞，对各位与会专家、学者的莅临以及上海欧洲学会和各界同仁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希望通过本次活动为上海地区的欧洲、德国研究学界搭建交流平台，聚合研究资源，助力推出高质量的咨政和科研成果，进而为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智库报告编译

在中美竞争中定位欧盟

2020年4月，德国智库“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SWP)”在其官网发表了Barbara Lippert and Volker Perthes主编的报告，题为《美中战略竞争：原因、进程及其对欧洲的影响》。报告称，美中竞争在过去两年里已成为国际关系的突出特征。它塑造了战略辩论和现实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动态。中美在权力和地位方面的竞争包括了越来越多的威胁感和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成分。美中贸易冲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并与世界秩序的发展密切相关。技术层面的关键不是谁制定标准，而是通过“技术政治势力范围”谋求地缘政治大国的意愿表达。因此，技术的开发和使用成为系统性竞争的一部分。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通过各自的领导风格影响双边冲突以及国际规则和机构。中美竞争也破坏了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在华盛顿退出一些多边机构的同时，北京正在扩大其在联合国等领域的影响力。欧洲必须摆脱要求它在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技术领域之间做出选择的两极逻辑。欧洲

联盟必须制定一项对中国的政策，以推动其主权（战略自治）。这就需要一种“超国家地缘政治”。为了解该报告最核心的观点，我们选译了其第一章（概述）《战略竞争的维度：中国、美国和欧洲的位置》和最后一章《在中美竞争中定位欧盟》。

战略竞争的维度：中国、美国和欧洲的位置（作者 Volker Perthes）

美中之间的竞争在过去两年中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典范。它塑造了战略辩论和现实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动态，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继续这样做。这并不是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竞争，甚至整个大国的竞争，决定了所有其他国际问题和冲突。但这种竞争的确越来越频繁地成为其他行为体看待重要事态发展和事件的镜头。至少对美国来说，可以说，与中国的战略对抗已经取代了自2001年以来盛行的“反恐战争”范式。

对本出版物的所有贡献都是在新冠病毒危机开始之前撰写的。同任何全球危机一样，这一流行病将对国际治理和合作模式产生影响，并对国际体系的结构产生影响。有可能——但绝不能肯定——危机的后果可能会在个别政策领域，特别是在全球卫生领域，使全球治理结构得到加强。若没有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大国的支持，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发生。但即使是一些政策领域加强合作，美中之间的竞争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可能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问题。在某些地区，这种流行病实际上可能助长竞争。这一点已经可以在意识形态领域看到，中国在最初因其应对病毒爆发的方式而受到批评后，现在凸显了其自身的——威权主义的——治理体系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的优势。这一流行病也可能见证一些国家通过表现出团结而获得软实力，而另一些国家则因为没有这样做而失去一些软实力。

自2017年以来，在美国政府的正式战略文件中，中国已经被视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在2019年12月的伦敦宣言中，北约首次谈到了中国的影响和国际政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中国的政治精英——正确地——相信，美国至少在寻求阻止中国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虽然贸易政策和贸易平衡的争端在美国总统的声明中占据最突出的位置，并直接影响到全球经济，但它们实际上只代表了竞争的一个方面，且绝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正如彼得·鲁道夫（Peter Rudolf）所展示的那样，冲突是多维的。

如果德国和欧洲联盟要对中美竞争采取自主的战略方针，分析清晰是绝对的先决条件：我们只有了解冲突的多维性，我们才能找到恰当的政治答案，并开发出必要的工具。

全球权力竞争

当前的问题是全球权力平衡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有理由相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优势——尤其是军事优势——本身视为目的，而不仅仅是促进特定利益和价值观的手段。习近平主席似乎更多地被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愿景所驱动，在这种愿景中，优势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但这场冲突也有关乎安全、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以及可以称之为人格的层面。本文集审视了每一个层面及其背景，以及美中竞争对国际机构和欧洲的影响。相关问题还包括守成的超级大国和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对其他国家、地区和社会的影响。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正如汉斯·贡瑟·希尔伯特（Hanns Gunther Hilpert）和古德伦·沃克（Gudrun Wacker）所展示的那样，美国永远不会自愿将重大的国际影响力让给中国。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复兴大国，其长期目标是全球霸权。正如马可·奥弗豪斯（Marco Overhaus）、Peter Rudolf 和劳拉·冯·丹尼尔斯（Laura von Daniels）所作的贡献所表明的那样，这在美国是一个广泛的共识问题，包括主要政党和整个商业、政治和社会。更多的考虑立场确实存在，但它们往往被边缘化。真正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方式的问题，即如何进行冲突。

也由于这个原因，硬安全挑战逐步升级，导致出现经典的安全困境。正如迈克尔·保罗

(Michael Paul)和 Marco Overhaus 指出的那样，这尤其适用于作为一个大国正在扩大其行动半径并处在逐步从沿海防御理论过渡到海上“积极防御”过程中的中国。但它也适用于美国，美国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不仅威胁到其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也威胁到其在亚太地区的伙伴关系和联盟体系，而且更长远地威胁到其核威慑力量。

关于贸易、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冲突

经济竞争和贸易、经济和金融政策方面的冲突本身就构成了竞争的一个现实层面，这早于美国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采取的保护主义的做法。华盛顿对中国的贸易实践、不公平竞争和违反规则的批评在欧洲广为认同。正如 Hilpert 和 von Daniels 在他们的贡献中所解释的那样，贸易冲突与世界秩序问题密切相关，而世界秩序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从欧洲的角度来看。比如，它涉及到具有约束力的多边贸易规则和机构的未来。这些问题在这两个国家也具有国内政治意义，具有强大的动员潜力，不完全取决于全球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影响了特定部门的就业状况。然而，Hilpert 认为，总的来说，与 1990 年至 2015 年期间相比，双方从经济合作中获得的物质利益有所下降。美中双边贸易不再是能够缓和政治冲突的稳定因素。相反，贸易冲突在政治上是工具性的，尽管它们也可能是复杂的美中竞争网络中最容易解开的结。或者换个说法：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对国际政治起决定性影响，即使华盛顿和北京成功地解决了重要的贸易问题，并设法在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之前缔结了一项贸易协定。

技术层面

竞争的技术层面更深，并将比任何假定的贸易争端解决方案更持久。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都成败攸关：谁才能长期获得——例如通过确定技术标准——最大的一块蛋糕。技术竞争也一直是一个安全问题。对于日益加剧的竞争和越来越多的不信任，同时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受到明显的限制，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正如 Matthias Schulze 和 Daniel Voelsen 所解释的那样，这种竞争也与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问题相联系：建立在数字产品和服务上的“技术政治势力范围”不再是纯粹的领土，而是仍然允许投放地缘政治权力，并巩固国际依赖性。

在这方面，技术的开发和使用问题越来越多地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联系在一起。它们成为系统对抗或系统性竞争的一部分，攸关内部秩序：涉及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治理之间的关系。希尔伯特将这一政治/思想层面置于自由民主范式与专制主义间的全球竞争之中。在包括欧洲在内的所有地方，这表面上可能是一场内部辩论，但它是由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两极分化共同决定的。维护世界秩序中的民主价值观和自由因素显然不是现任美国总统的优先事项。但对美国国会来说，这两个问题都是中美竞争的前沿和核心，国会两院都在努力推动这方面更果断的政策——最近一次是在 2019 年 11 月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美国的辩论的特点是担心中国的崛起和被超越的可能性。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正如希尔伯特所概述的，中国精英仍然感到不安全，受到自由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威胁。尽管中国已经推翻了西方的自由期望，即如果国家经济发展并带来日益繁荣，民主和法治或多或少会自动出现，但情况依然如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取得了成功，而自由价值观仍然很有吸引力，特别是对年轻、受过良好教育和流动的中国社会成员。这解释了中国领导层对香港的紧张、对颜色革命的明显夸大的恐惧、以及为掌握权力和通过技术手段建立自己理想的和谐社会所做的全面努力。

正如舒尔茨和沃尔森所指出的，技术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开发越多地涉及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基本问题，技术竞争就越多地与战略竞争的政治/层面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数据收集

和处理、人工智能还是生物技术。如果中国的技术投资能够使个人数据大规模外流，那么德国和欧洲联盟也必须解决诸如对致力于保护个人权利的欧洲国家和社会模式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对中国高科技公司开发和出口监控技术和社会控制技术如何不仅有助于专制和镇压，而且有利于传播非自由的管理和社会的概念的情况进行严格调查。

不同的领导风格

人们可以讨论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个人因素、个性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美中竞争的一个层面。无论如何，Gunther Maihold 认为，他们这两种不同的非常个性化的领导风格将继续影响中美关系。特朗普的交易型风格和习近平的对外和对内的改革型风格是高度不相容的。它们往往破坏仍然存在的信任基础，限制外交手段的可能性，加剧双边冲突。其他国家包括欧洲联盟，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获得自己的挪腾空间。但是，他们主要必须努力维护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它们正受到华盛顿和北京不同方式的损害。

国际影响

即使这里所描述的冲突和竞争被理解为一种双边竞争，并在某种程度上扩展开来，其意义和影响是全球性的：它影响到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影响到地区甚至欧洲的区域动态，影响到国际组织和论坛（如 20 国集团或联合国及其机构）的工作，正如劳拉·冯·丹尼尔斯所描述的那样，它往往足以破坏多边机构。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尤其明显，该组织的规则遭到双方的违反，特朗普政府还试图削弱其职能。中国正在按自己的中国中心秩序概念建立新的国际论坛和组织，特别是在自己的区域环境中。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没有任何退出国际和多边机构的迹象。相反，它正在积极努力扩大其在联合国及其机构和项目内的影响力。中国承担更大责任，承担更大份额的费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途径，尤其是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但与此同时，它试图以联合国的语言确立自己的政治术语和价值观。虽然特朗普将美国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但中国却努力在其中建立自己的理念，例如通过将个人人权的重要性相对化。

欧盟及其成员国直接和间接地受到中美竞争的影响。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德国可能比其他欧盟成员国更重要。欧洲不再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具有不同利益的谈判伙伴和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也是一个“推销替代治理模式的系统性竞争对手”。然而，从欧洲的角度看，中国仍然是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合作伙伴，首要但不仅仅与气候保护有关。欧洲不可能对“脱钩”有任何兴趣，因为正在讨论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准备的这种“脱钩”的意思是断然切割技术和经济的联系。像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集团一样，欧洲也必须抵制迫使它在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和技术领域之间做出选择的两极逻辑。相反，它别无选择，只能在现实的相互依存和共同规则的基础上努力建立可持续的长期联系。然而，正如一些利益集团偶尔在欧洲辩论中提出的那样，对中国和美国保持同等距离不是一种选择。因为，在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问题上，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无论欧美间有多大的差异，将欧美凝结成价值观和安全共同体的联系可能仍然比美国或欧洲国家与任何其他国际伙伴的关系密切得多。

欧洲新战略

正如 Annegret Bendiek 和 Barbara Lippert 所强调的那样，欧洲必须发掘自己的力量，制定一项中国政策，它不仅被视作一项“国家战略”，而且是作为全面的欧洲自主战略的一部分，或者换句话说，作为争取更大的欧洲主权或战略自主的一部分。这需要更多的超国家性，或者 Bendiek 和 Lippert 所称的“超国家地缘政治”，特别是在涉及到中国时。目前正在制定有助于欧洲对中国采取自信、审慎政策的工具，如以国家立法为补充的外国投资审查。

诀窍是通过增强社会和技术的抗风险能力，在不削弱合作和相互依存的情况下，为欧洲应对更激烈的竞争做好准备。这一战略不仅适用于与中国的直接关系，而且也适用于欧洲的国际和全球整体形象。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和社会重视中国的经济参与及其一带一路倡议，但担心片面的依赖。在这方面，欧洲联盟对亚洲的联通战略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同样明智的是，欧洲为非洲基础设施提供的资金已经相当可观，例如通过欧洲投资银行提供的资金。最后，欧洲国家必须扩大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和论坛的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必须填补由于华盛顿现任政府的不关心或退出而造成的空白。这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证明欧洲对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的理解完全不同于中国中心的多一双边主义。

在中美竞争中定位欧盟（作者 Annegret Bendiek and Barbara Lippert）

围墙正在逼近欧洲，它有可能被美中两国的竞争压垮。一方面，欧盟成员国显然不同意特朗普目前对中国的政策，并担心太平洋地区贸易争端和地缘政治对抗升级的深远后果。另一方面，在与北京的来往几乎完全集中在市场准入和出口机会上之后，欧洲对中国的看法也更加暗淡。在 2019 年 3 月发表的一份战略文件中，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德里卡·莫盖里尼采取了一种新的更尖锐的语气：对欧盟来说，中国不仅是国际合作的重要伙伴，也是经济竞争对手和系统性竞争对手。

中国是欧洲自主的一个考验

然而，在欧洲，与美国不同的是，在结构性的全球冲突中，没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流派将中国视为新的大敌。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并不侧重于地缘遏制和脱钩。相反，它希望在互惠和共同商定的原则和规则的基础上，在欧洲和中国之间发展一种互惠的、主要是经济/技术的相互依存关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洲联盟需要团结一致，具有应对冲突的能力，具备必要的合法性，并获得必要的工业/技术抗风险能力。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代表了欧洲自主的一个考验。

欧洲在中国问题上的团结与分裂

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以合作、竞争和冲突为特征。正是这种矛盾的、由问题驱动的区域间合作需要使市场参与者和成员国的多样化的个体利益与欧盟的整体利益和法律基础相协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成员国越团结，欧盟的谈判力量就越大，应对北京时实现欧洲利益的能力就越有效。但成员国还没有准备好将对华相关政策领域的相应权力或集中协调重新让渡到欧盟层面。这有各种原因。欧洲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但只是少数几个数字技术的市场领导者。由于它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被迫进口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技术和资源，某些成员国对这种依赖非常敏感。这延误了理事会的决策，削弱了欧洲联盟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在人权问题上，这常常使欧盟无法对中国制定一致的政策。波兰和匈牙利在联合国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使欧盟国家不能形成统一战线。在 2019 年 4 月的欧盟-中国峰会上，一些成员国反对欧盟对中国的共同立场，因为他们担心北京可能会对人权批评等明显的冒犯采取经济报复或其他制裁措施。2019 年 3 月，意大利成为第一个签署中国“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的 G7 国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罗马颠覆了其他成员国的愿望，即只进行欧洲以一个整体参加 BRI 的谈判。

在中国和美国问题上的分裂。

在欧盟国家未能与美国合作的情况下，分裂的情况更加严重，华盛顿很快就会利用这一点。例如，波兰与美国签署了双边导弹防御条约，并向华盛顿承诺将把中国技术排除在 5G 网络之外。这些具体承诺很难与所有成员国的统一战线相协调。欧盟自然与美国有着个体的

非常广泛的经济、安全和规范利益，而与中国保持着很大的距离。但欧洲对华政策不能像过去那样建立在跨大西洋关系的基础上。它现在存在于一个新的坐标系统中，主要由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轴线决定，欧洲联盟必须在其中找到并保持自己的立场。

外交和安全政策

欧洲联盟在亚太地区不是一个成熟的外交政策和安全行为者，但所有成员国在这个地区都有外部经济利益，在发生危机时当然必须捍卫这些利益。特别是法国和联合王国，它们依靠可追溯到殖民时代的联系，在东亚保持有自己的海军存在。南海是国际货物和原材料流动的重要运输通道，因此那里的军事冲突将对欧洲联盟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产生巨大影响。法国和联合王国已宣布打算扩大其在远东的安全存在。它们协助南中国海沿岸国家通过技术转让和武器销售使其武装部队现代化，支持它们通过扩大海军力量确保自由进入该海域的努力，并提供救灾、网络防御和反恐援助。巴黎和伦敦将自己视为“西方和欧洲在该地区利益的监护人”。法国希望看到欧洲履行其在该区域的一些承诺，例如通过包括联合王国在内的欧盟舰队。从 2020 年起，计划派遣一名德国海军军官到新加坡海军信息融合中心。

安全和经济问题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例子是使用中国技术公司华为的部件实现手机网络的现代化。关于欧洲基础设施，华为本身并未被排除在单一市场之外。电信部件的可靠性问题已纳入市场监管的逻辑。根据新的欧盟 5G 安全工具箱和《欧盟网络安全法》，所有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提供者和供应商都将受到分级控制，并必须满足硬件和软件的严格认证标准。所有主要的互联网平台——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都有可能使监管资本主义成为可能，因此它们都对欧盟的数据保护、数据安全和竞争法律感兴趣。

如果发现华为的数据泄漏，或者发生了针对数字信息的网络破坏事件，其后果将是该公司被排除在单一市场之外。这反过来将决定性地加速欧盟的努力以实现对于中国的数字主权。在北约问题上，欧洲联盟和美国对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并防止其遭到攻击有着共同的利益。一个事件可能引发一场西方和中国都试图排除所有可能的社会和技术漏洞的竞赛。威胁加剧的后果是军备竞赛和巨大的经济损失。

作为贸易和监管力量的欧盟

欧盟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作为贸易和监管力量的实力，就连中国也必须承认。在日益冲突的欧中关系中，经济是主导因素。在许多方面，欧盟赞同华盛顿对中国不公平竞争做法的批评。但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在贸易问题和世贸组织原则上有自己的分歧，这反过来又使得大西洋两岸对北京采取共同路线变得更加困难。

贸易：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自 1975 年以来，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增长了 250 倍，到 2018 年达到 6800 亿美元。在欧盟内部，最具竞争力和最大的出口国是中国政策的推动者。欧洲联盟直接和间接地受到华盛顿对中国惩罚性关税政策的影响：铝和钢铁受到直接影响，贸易流动被转移（例如大豆）是间接影响。在美国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后，欧盟被迫对来自第三国的钢铁产品实行进口配额——令依赖进口钢铁的欧洲汽车工业懊恼不已。而在 2018 年 7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同意，欧盟宁愿支持美国的贸易利益，而不是支持传统上是欧盟最大的大豆供应商的巴西的贸易利益，作为对华盛顿的让步。欧美贸易争端有可能掩盖跨大西洋关系中多边解决方案的共同利益。这使得利用世贸组织机制来让北京有效执行自由贸易原则——如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和投资条件的对等原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与中国有着重要经济关系的德国和法国等欧盟国家，企业和组织都呼吁对北京的不公平做法采取强硬和果断的立场。欧盟指责北京系统地补贴中国的私营和国有企业，以便在全球范围内给予它们竞争优势。作为

回应，特别是法国和德国赞成欧洲联盟制定一项产业战略，致力于在数字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方面迎头赶上，以加强欧洲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地位，这些中小企业构成（数字）内部市场和欧洲经济模式的主干。同时，布鲁塞尔应改革与市场相关的国家和欧洲企业的竞争法，例如促进气候和环境技术的战略可持续性议程。这也将使这些公司的竞争条件比中国的通常部分由政府主导的公司更公平。

投资：欧洲联盟最近改革了其外国投资控制制度，着眼于中国在单一市场的活动。紧随美国立法，它加强了国家对市场参与者进行干预的权利。在这方面，布鲁塞尔成功地弥合了成员国的不同偏好，通过了一项甚至葡萄牙、希腊和匈牙利等都能同意的条例。后者担心，如果新的外国投资审查规则过于严格，将会有不利之处。在这方面，欧盟特别将中国视为经济竞争对手，因为中国正寻求从战略上收购欧洲联盟的高科技研究和制造领域，如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生物技术。欧盟的新规定是一种妥协。它规定建立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框架，在此框架内，各成员国在自己作出最后决定之前进行自己的外国投资审查。共同的标准涵盖安全和公共秩序，但忽略了更广泛的经济问题，如与竞争法或产业政策有关的问题。欧盟国家在投资控制方面的统一与法国和德国在监管偏好方面的差异形成了鲜明对比。具体来说，欧盟各国对华为参与欧洲市场 5G 基础设施建设的愿望没有达成共识。那些不排除华为参与的人反对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政府认为华为是一个敌对政府派来的特洛伊木马，其政策与美国的安全利益是不相容的。在这里，华盛顿明确的地缘战略观点与欧盟首要的经济观点相冲突。然而，由于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性或脆弱性，联合王国和德国也为供应商规定了严格的安全标准。法国已经对外国供应商实施了更严格的安全测试。欧洲联盟委员会出版了自己的 5G 工具箱，其中包括关于安全和可靠性标准的明确建议。

建立在欧盟作为贸易和监管力量的资源基础上的超国家地缘政治

数字单一市场的监管：欧盟制定和实施数字单一市场规则的努力符合其与中国关系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与美国关系的界限。例如，特朗普对欧盟委员会对美国谷歌违反欧洲竞争法一再处以罚款的反应，反映了美国和欧洲之间日益增长的不信任。美国总统认为这是一个“讨厌美国的税务女士”的报复行为，他称之为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维斯特格。事实上，大西洋两岸的监管理念越来越难以调和。在《欧洲联盟条约》中，成员国承诺实行竞争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条，标准工作组）和民主（第二条，标准工作组），并强调个人的普遍权利（也涉及个人资料）。欧洲联盟将各利益攸关方和市场参与者纳入其进程，并在这些进程中遵守基本权利。这一多方利益攸关方办法也见于欧洲保险机构关于（数字）单一市场及其议程的机会和挑战的当前立场文件。欧盟机构赞同建立一个民主、基于社区和包容性的（数字）社会的想法。由此，欧洲联盟界定了对中国和美国的利益、偏好以及监管政策的工具。这一政策是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合并控制和限制爱尔兰等个别成员国对美国苹果公司慷慨的税收政策来表达的。如果欧洲联盟不能成功地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合作，为网络安全和工业 4.0 制定永久的安全和建立信任措施，那么数字公域就有可能在全球崩溃。合作也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先决条件，例如在数字化（工作）条件下确保社会和平与正义。区域和全球范围的繁荣和稳定决定性地取决于遵守信息技术安全方面的共同最低标准以及国家在网络空间行动和建立共同治理结构的规范。

超国家地缘政治

欧盟与中国和其他大国打交道的强大之处在于其成员国的民主配置、超国家体制秩序和自主法律秩序、单一市场的规模和潜力、共同货币领域以及共同的贸易和竞争政策。这些因素提供了巨大的潜力；要充分利用它，需要以下几点：首先，欧洲联盟对中国的政策是最有

效的，它不是被认为是一项纯粹以国家为基础的战略，而是嵌入到欧洲联盟自信的全面和整体的战略中。第二，在新的大国竞争的条件下，欧洲联盟最好通过进一步超国家一体化和加强其集体行为能力来维护自己。超国家地缘政治从欧盟作为贸易和监管力量所拥有的资源开始。这是其全球谈判力量的核心来源。从逻辑上讲，工业政策、市场准入和数据安全等议题是新的“地缘政治委员会”议程上的重要议题。新的多年财政框架还必须重新确定这些优先事项，欧洲联盟必须加强欧元区以及外交和安全政策一体化的逻辑。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内部市场，欧洲联盟完全有理由满怀信心地与中国接触，既不加入美国的遏制战略，也不加入整个经济空间脱钩的战略。合作和竞争是自我主张政策的合法模式，通过旨在缩小技术差距的现代产业政策进行自我保护也是如此。中国首先在地缘经济领域运作，这也是欧洲权力资源所在的地方。与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 BRI 项目上建立战略相互依存关系，但在世贸组织的规则上抗争。与此同时，欧盟-亚洲互联战略可以增强欧洲的自信：战略上的相互依存——而不是脱钩——是应对中国的更有希望的方法。这还包括欧洲联盟通过合作，向第三国提供中国直接投资的替代方案，这对受援国来说是有利可图的。欧盟一直认为亚洲不仅仅是中国。因此，欧洲联盟应在其与日本、印度和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合作和自由贸易协定中增加外交和政治分量。它的亚洲集体外交首先需要扩大到法治、民主和人权领域，理想的情况是——就像其他问题一样——与美国一道。为了能够与中国长期抗争，欧盟将不得不加强其超国家地缘政治的能力，这也是理想的跨大西洋协调和支持。德国政府应与法国、欧盟委员会和欧元区国家一道，探讨跨大西洋贸易协定在取消工业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方面的优势，以便在即将举行的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中加强欧盟对北京的议价能力。下一次欧盟-中国峰会定于 2020 年下半年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举行，并应由议会组成部分予以支持。独立于具体议程，对中国最重要的意义是欧盟成员国坚定地团结在其优先事项之上，首先是在所有各级和所有政策领域实行基于原则的政策和互惠。

原标题: Strategic Rivalry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uses, Trajector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Europe

作者: Barbara Lippert and Volker Perthes (eds.)

发布时间: 2020 年 4 月

资料来源: www.swp-berlin.org

智库来源: 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 (SWP)

简讯

* 2020 年 7 月 3 日，上海欧洲学会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在该院合作举办“后疫情时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与中欧关系前景研讨会。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同时也给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带来了严峻挑战。欧洲作为疫情“重灾区”，在疫情蔓延之初出现了欧盟职能缺失、协调不力等窘境，欧洲一体化进程一度蒙上阴影。但随着欧盟的及时调整和主要成员国的积极推动，欧盟不仅在协调防疫举措和资源、合力研发疫苗等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也针对疫情给欧洲经济与社会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制订了一系列的复苏计划，一体化前景似乎获得了新动力。同时，欧盟的对外战略也并未受制于疫情而停顿或收缩，反而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提出诸多具有欧洲特色的倡议和主张。受疫情影响，中欧之间既定议

程搁置延误，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双边关系产生一定影响，但同时中欧关系亦具有新的发展动力。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与中欧关系前景，曹子衡、陈琦、戴轶尘、丁纯、龙静、宋黎磊、徐明棋、忻华、杨海峰、叶江、张骥、张迎红、赵隆、郑春荣、祝轶晨等与会者进行了交流讨论。

* 2020年7月15日，学会举办英国对华政策座谈会。曹子衡、陈琦、吉磊、忻华、徐明棋、杨海峰、叶江、朱联璧、祝轶晨等参加会议。

* 2020年7月22日，上海欧洲学会与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转型中的欧盟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研讨会。会议围绕欧盟结构转型的特征及挑战，以及中欧关系动态及推动中欧合作发展的路径两个主要议题展开学术研讨。来自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欧洲学会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 2020年7月24日，学会举办中美欧关系座谈会。曹子衡、吉磊、沈赟璐、伍贻康、徐明棋、薛晟、杨海峰、郑春荣等参加会议。

* 2020年7月29日，学会举办巴尔干地区形势座谈会。曹子衡、费正健、高晓川、徐明棋、杨海峰、张耀、祝轶晨等参加会议。

欧洲观察

2020 年第 6 期 总第 179 期

《欧洲观察》是上海欧洲学会的内部交流刊物，主要报道学会活动情况、刊发会员研究成果、编发欧洲政治经济动态。

上海欧洲学会是由上海各高校、研究机构从事欧洲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团体，旨在开展欧盟一体化及欧洲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问题的学术研究和对外交流。

主办：上海欧洲学会

协办：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

编辑：《欧洲观察》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威海路 233 号 803 室

邮编：200041

电话：0086-21-63339207

电子邮件：mail@sies-cn.org

网址：www.sies-cn.org

European Survey

No. 6, July 2020

European Survey is an intern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of which contents include SIES news, European news and research papers etc.

SIES is an academic society consists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who devote to research and fostering debate on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other relevant issues in Europe and promoting academic exchange with European institutions.

Organizer: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Editor: Editorial office of *European Survey*

Co-organizer: Center for European Union Studies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ddress: Room 803, No. 233 Weihai Road, Shanghai, China

Post code: 200041

Tel: 0086-21-63339207

Email: mail@sies-cn.org

Website: www.sies-cn.org

2020 年 7 月 30 日印发